



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山东省潍坊市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山东省潍坊市革命烈士陵园位于潍坊市奎文区，是国家级烈士纪念馆。陵园始建于1951年，占地35110平方米，现安葬烈士1834名，含无名烈士525名。革命烈士纪念碑是陵园的标志性建筑，建于2000年10月，仿照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风格，碑身高26米，碑的底座四周是一组汉白玉浮雕。碑身正面大理石上刻有“革命烈士纪念碑”7个镏金大字，背面是碑文，全文如下：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历次革命斗争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二万五千余名潍坊籍及外地在潍坊工作、战斗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祖国为人民壮烈牺牲。他们中有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而舍生取义的革命先驱者，有在反侵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爱国将士，有解救潍县等地血洒疆场的指战员，有建国后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崇高利益而慷慨捐躯的时代英雄。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业与日月同辉，其浩然正气同天地共存。缅怀先烈，激励世人矢志奋发，振兴中华，发展潍坊，特立此碑。巍巍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潍坊市委
潍坊市人民政府立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碑文概述了潍坊先烈们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充分体现了先烈们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英雄本色，表达了对先烈的缅怀之情，读来令人感慨万千、深受鼓舞。

传播马列主义星火燎原。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为了寻求真理的火种，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革命的种子在潍坊大地发芽。1924年9月，潍坊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寿广支部在寿光诞生；一间小土屋、一张小方桌、一盏黑油灯矗立起一座红色战斗堡垒，这是我军在陕北窑洞里成立的延安通信材料厂自主生产制造的，它也成为那段峥嵘岁月里，边区军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造无线电设备，打破敌人通信技术封锁的历史见证。

中共中央对于在红军作战和白区工作中使用无线电联络的重要性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1928年起，中共中央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红军作战和白区工作所需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红军开始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后，对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的需要更为迫切。1930年12月底，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了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随后，

立了山东省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南屯农民协会，参与创建了潍坊第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潍县赤卫队，夺取敌、砸税局、截军粮、抗租抗粮、开展大柳树暴动，潍县大地燃起革命烈火。1928年10月10日，庄乐甲在养病期间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厉声怒斥刽子手，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白色恐怖吓不倒英勇的共产党人，1928年12月，高密县委书记王全斌被捕，当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割去舌头，被逼着写“自首书”时，他写道：“共产党好，能救国救民……”虽受尽反动派摧残，他仍抗争到底，英勇牺牲。

打响了鲁东抗日第一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寇侵略的铁路，中共寿光县委根据鲁东工委指示，在牛头镇马保三家中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起义军番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担任总指挥。1937年12月29日，寿光700多名游击队员肩扛长枪，手持长矛，身背大刀，集结在巨淀湖畔，举起了寿光人民抗日救亡的大旗，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就此爆发。1938年2月4日，八支队进驻县城南关三里庄设伏，击毙日军3人，缴获日军指挥车1辆，打响了鲁东抗日的第一枪。八支队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随后挺进胶东、挥师清河、转战鲁中，在抗日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八支队的战士们将生死置之度外，1938年11月8日，我军指挥部和大批群众被困在六天务村，为掩护指挥部和群众安全转移，八支队十三大队160名指战员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激战。大队长孙善卿连中七弹，浑身血肉模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全体指战员的拼死掩护之下，指挥部和群众成功突围，但160名指战员最后仅有17人生还。

华东第一个城市攻坚战。潍县战役是华东战场上的第一个城市攻坚战。战役从1948年4月2日发起到5月8日结束，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及各解放区部队确立“稳打稳扎、逐次歼敌”打法，先肃清外围，夺取城关，再强攻西城。4月8日傍晚，外围战正式打响。23日晚，



我军以迅雷之势强攻西城。先以重炮轰击，继而炸药爆破，打开城墙缺口，随即抢架云梯，浴血登城。面对敌人的猛烈反击，双方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战斗异常惨烈。由于后续部队进攻遇到困难，突击部队接连打退敌人反击10多次，直至子弹打光，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战，高喊“人在突破口在”，一直坚守阵地，用身体守住了突破口阵地。24日凌晨，为建立正面阵地，79团5连等160多人奉命下城作战。在战斗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指战员从城墙上英勇跳下，血战荷花湾，为大部队入城作战开辟了前进阵地。24日晚，西城胜利解放。27日中午，顺利解放东城。潍县战役歼敌46万余人，1432位解放军指战员英勇牺牲，摧毁了敌人的“鲁中堡垒”，使胶东、渤海、鲁中三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孤立了济南和青岛

之敌，有力推动了山东和全国的解放。**建成山东省第一大水库。**为了解决淮河南下游两岸的洪涝灾害、农田灌溉和吃水问题，当时的昌潍地委决定修建峡山水库。从1958年11月开始，到1960年10月，10万多群众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水利工程兴建。为了赶进度，不分白天黑夜，奋战在工地上。当时，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夜战峡山”。一到晚上，工地上灯火通明，远远望去，像一座不夜城。峡山水库的建成，是10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离不开库区移民作出的巨大牺牲，不仅根本解决了淮河南下游两岸的洪涝灾害，远远望去，像一座不夜城。峡山水库的建成，是10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不仅根本解决了淮河南下游两岸的洪涝灾害，而且成为山东省重要的战略水源地。

(展春霖)

战争岁月

宋庄防御战：八路军以少胜多

1942年6月8日夜间，八路军冀中二十二团两个连在执行反“扫荡”任务结束后，来到群众基础好、有地道和围墙依托的河北省深泽县宋庄，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抢筑了三道工事。

9日早上，据侦察员报告，日军2500人向宋庄包围过来。指挥员立即指挥战士们严阵以待。

不久，日军发起冲锋，八路军依据村外第一道工事阻击日军。埋伏在土墙后的八路军战士保持隐蔽，直到敌人冲到50米内时，战士们突然猛投手榴弹。这些手榴弹是加大了爆破药装量、专门用来炸碉堡的，炸得敌人死伤惨重，活着的敌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威力的手榴弹，吓得扭头就跑。

日军不甘心失败，分兵从东西两侧发起进攻。指挥员见状，立即派出神枪手加强防守。

一连七班守在东边，七班长叫李清斋，是一个特等射手。他在一堵土墙下，采用跪射姿势，连打7枪，击毙7个日军。其他战士们也都弹不虚发，很快击退了村东的敌人。与此同时，守西村西的二连和进犯之敌发生了激烈战斗。副连长廖志国发现日军在不远的地方架起了一部电台，附近还设有一个机枪阵地。廖志国选择好射击位置，在日军机枪射手和弹药手接运子弹的时候，将两

个敌人击毙。二连机枪手边廷杰，也是出了名的神枪手，在激战中，他接连毙伤31个敌人。在二连的顽强阻击下，日军的攻势很快遭到挫败。

日军多次进攻失败后，先调来大炮向一连阵地狂轰滥炸，然后又命令日军以班为单位，举着轻机枪发起冲锋。一连战士沉着应战，神枪手专打举着机枪冲锋的敌人。经过激战，日军在丢下30多具尸体后，再次逃走。

敌人仗着人多，很快又发起了冲锋。一连先以步枪迎敌，当敌人冲到距一连阵地仅30米的地方时，再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和榴弹筒突然开火，又消灭了不少敌人。

敌人久攻不下，于是开始施放毒气。此时，八路军战士已经和敌人激战了8个小时。指挥员果断命令战士们退到第三道工事坚守。敌人进入第一、第二道工事后，天色已近黄昏，由于地形不熟，不敢贸然再进，敌我双方形成暂时对峙。

夜色降临后，乘敌人松懈之际，八路军突然从地道杀出，先头班用手榴弹开路，很快突破敌人的重围。这一战，冀中二十二团两个连连续打退了日军38次进攻，在打死日军600余人后胜利突围，创造了抗战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防御战经典战例。

(吴小龙)

中华英烈 ★★

安志敏：首批开辟新中国空中航线的建设者

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我军歼灭，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国民党空军人员，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好准备，3月17日，中央军委成立了航空局。为开辟空中航线，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西南，5月，航空局专门增设了航行处，并任命安志敏为处长。

安志敏，1916年8月生，四川省阆中县人，1933年6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月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营、团、师部书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第一科见习参谋等职。后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西路军西征失败后，他随左支队历尽艰险到达新疆星星峡，任总部警卫班长。

1938年春，安志敏被从“新兵营”调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飞行。1942年9月与航空队的同志们一道被捕入狱，1946年7月在党中央的营救下回到延安。后被组织派往东北建设东北老航校。曾任飞行大队副大队长等职。

开辟新的空中航线，对航空局来说是一件新任务，对安志敏来说，更是千斤重担。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当时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经验。但这是航行处的职责，作为处长的安志敏责无旁贷，必须全力以赴。当时，除东北的空中航线较有保障外，其他地区有的机场破坏严重，必须进行大量的修补工作。在西北地区，西安、兰州机场勉强保障飞机起降，酒泉机场则需要抢修跑道及导航、气象等保障设施。安志敏紧紧依靠当地党政军各方的大力支持，动员一切力量，截至1949年10月底，先后修复机场40余个。与此同时，他抓紧开辟新航线的工作。

空中航线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多部门协调的问题。对今天的飞行员来说，航线相对简单，因为现在天上有卫星，地面有引导雷达，机上还有罗盘、惯导、数据链等多种设备，空中飞行只要按照规定的行驶路线，确保飞机在规定的“道路上行驶”即可。

但安志敏领导的航行处可没有现在的飞行员这么荣幸。每次确定航线、校正航线时，他们只能采用最传统的方式，依靠导航员、飞行员的肉眼观察。导航员拿着地图，对照地貌，来确认自身的位置。这种传统的导航手段晚上不能用，天气不好也不能用，海上不能用，而且在陌生地域容易迷路。

如果地貌看不清，安志敏他们就利用罗盘加怀表来确定航线，这也是一种最传统的方法。这种方法因为受飞机速度慢、阵风等外界因素影响，往往偏差较大，安志敏等航行处的同志只能采取最原始的目视飞行，靠地标确定航线飞行。



在开辟一条新航线时，还要进行校验飞行。校验飞行是一种边缘飞行，它是在没有导航设备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大量起落、低空科目的飞行。人们把从事飞行校验工作的人，称为“开辟天路的人”。特别对专机飞行，飞行目的地为生僻机场，面临国内飞机从未飞过、缺乏机场资料、当地航线保障水平差、地形复杂的情况时，要求专机飞行之前，进行航路先遣考察飞行。

为了确定航线，安志敏每条航线每个机场自己都要飞一遍。有次试飞兰州，快到兰州机场上空，天色渐黑，气象骤变，乌云盖顶，跑道的指示不明显，安志敏隐约能看到机场延伸的跑道，他坚决果断地朝着那条隐隐约约的跑道飞去，最终安全降落。事实证明，如果再晚一点，大雨倾盆而下就会有危险。

截至1949年10月，安志敏领导的航行处先后开辟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新的空中航线。新航线的开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按照上级的部署，安志敏还配合航空局其他部门一起，执行了保障专机的任务。开国大典前夕，负责接送中国国家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商国是。安志敏还协助方周周密设计开国大典的飞行行动，并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新中国成立后，安志敏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六航校校长、空军第五军副军长、空军第三军副军长兼航空兵第六师师长、空军第五军军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驻越南空军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卓卓田 李贵州)

军史文物

一台见证边区军民打破敌人通信技术封锁的收报机 窑洞里的“通信工厂”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收报机，它曾是中央军委总部在延安指挥千军万马的通信工具。这台收报机是由我军在陕北窑洞里成立的延安通信材料厂自主生产制造的，它也成为那段峥嵘岁月里，边区军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造无线电设备，打破敌人通信技术封锁的历史见证。

中共中央对于在红军作战和白区工作中使用无线电联络的重要性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1928年起，中共中央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红军作战和白区工作所需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红军开始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后，对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的需要更为迫切。1930年12月底，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了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随后，

红军利用在东韶战斗中缴获的一部完整电台，加上这“半部电台”，建立了无线电队，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红军总部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步壮大。至长征前夕，红军总部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培养了一批无线电技术骨干，为抗战时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抗战爆发后，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八路军总部决定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然而，由于当时敌后根据地物资匮乏，且敌人在各地实行“囚笼”政策，各根据地被严密封锁、分割成块，使得通信器材的获取变得极为困难，如何有效指挥调度各地部队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当时负责保障全军通信联络的军委三局，决心成立延安通信材料厂，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无线通信装备，以保障通信联络的畅通。

1938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厂在距离延安10余公里的盐店子村正式成立。工厂由10余个窑洞和四五间小平房组成。建厂初期，通信材料厂的主要设备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机1台，全厂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只有20余人。

在条件艰苦、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通信材料厂员工在党中央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攻坚克难，靠着热血和智慧进行技术创新。原材料不足便从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等物品中就地收集，缺乏教学设备和资料就依靠实践摸索，没有标准生产图纸就自己设计机器底板图、面板图……通过反复试验和改进，延安通信材料厂相继制造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键等元器件。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通信材料厂先后装配数百部由电池和手摇发电机供电的小型电台、电话单机和总机。至1938年底，通信材料厂的元器件自给率达到了40%，两年后达到70%。

通信材料厂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不断制造出新设备。随着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材料厂制造了一批能够进行更远距离通信的50瓦、100瓦大功率发报机；为了让党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材料厂专门为新华社通讯社制造了500瓦发报机；为更好支援敌后战场游击作战，材料厂还试制了小型报话机，仿制了日式小型手摇发电机……这些性能更优、功能更全的无线电设备，确保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调度与信息交流畅通无阻，同时也大量供应前线作战部队，满足各抗日根据地通信联络的需要，成为对敌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八路军无线电技术的成熟，也与通信系统人才队伍的壮大相辅相成。最初，材料厂的工人中既有经历

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也有从上海、武汉、北平等地前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随着业务需求增加，经过长期实操与系统培训的工人专业技术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特别是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又称“延安通校”）的成立，带来了一批宝贵的通信技术专家。他们不仅在学校的教书育人，也参与到材料厂的研发制造中。同时，材料厂也成为延安通校学生的实操平台，他们在这里将理论转化为实践，通信材料厂逐渐成为为党培养通信人才的重要阵地之一。

抗战时期，一台台无线通信设备就这样从窑洞里的“通信工厂”中生产出来，装备到各部队中充当战场联络的“神经元”，织密了一张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各部队、各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无线电指挥通信网络，使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命令化作一道道红色电波到达前线，指挥着千军万马，在多次重大战役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947年，国民党军声势浩大地对延安发起进攻，党中央决定战略性撤出延安。延安通信材料厂被迫解散，相关生产设备和技术骨干分散到其余各解放区，组建新的通信器材厂，继续为通信事业贡献力量。尽管延安通信材料厂已不复存在，但从那段艰苦岁月里走出的“通信工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通信事业的重要起点，激励着一代代通信人奋勇争先、不断前行。

(杨润鑫 程宇一)



中央军委总部在延安时使用的我军制造的收报机